抗战初期在浙南

粟　裕

1937年9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宣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我们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等同志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岔，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等胜利会合。这时，我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 年 4 月，在刘英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 3 天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 8 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 月 16 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

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1935年初挺进师挺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3个支队和1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3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

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便和曾山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1934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3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1942年春,刘英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5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3月18日，我们由平阳山门出发，欢送的人群是饱含深情的，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3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

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着我们，大家都要为迎接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曾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我们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时，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日前线。我们行军 1 个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 3 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新的发展。

（原载《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193 至 200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闽北、南昌之行

余龙贵

1937年1月，在泰顺峰门战斗中，我负伤留在冬瓜坪黄明星家里，后被送到福鼎县郑丹甫那里养伤。9月间，张文碧带部队找到了我们，于是我们跟张文碧等一起连夜动身，赶到平阳北港山门和刘英会合。那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已经达成协议，分散在平阳、泰顺、福鼎、瑞安、青田等地的部队已开始到山门集中。当时消息闭塞，我们还不知道闽北、赣东北红军的和谈情况。为了尽快地和这些地方红军取得联系，以便相互配合，统一行动，1937年10月间，刘英派陈铁军、苏斗正和我3人，去闽北、赣东北地区找那里的负责人黄道和关英联系。

不久，我们3个人通过组织关系，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搞到一张通行证，穿着便衣，带了些钱和一个装有我们3个人行装的包裹（为减少误会而不带枪），从平阳出发抄小路西行。临行前，刘英口头向我们布置了任务，并亲自送我们上路。

按照刘英的吩咐，我们这次西行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向黄道介绍我们现在的情况。即闽浙边临时省委已和国民党当局和谈，并达成协议，我们的部队虽在敌人的"围剿"中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主要骨干还幸运地保存着，来自各地的200余名武装人员已在平阳山门街集中；临时省委现正在和国民党进一步合作，准备在浙南一带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浙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地方青年的革命要求也很强烈。二是向黄道、关英了解他们是否下山和国民党合作，是否与中央分局取得联系等情况。我们经平阳坑、百丈口，进入景宁、庆元、浦城等县山区，花了20多天时间。

一路上，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故意刁难，我们3人遇到很多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烦，甚至生命危险。一天，当我们精疲力尽地来到景宁坑口小溪镇时,遇到了国民党部队的 1 个排,他们事先已有准备,等我们一到就一拥而上，用刺刀对着我们的胸口进行盘问、搜身，并不由分辩地说我们是“土匪”，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带到镇上，说要处治我们。在镇里又有八九个士兵，用刺刀威逼着，把我们带到排长那里去审问,并要扣留我们。我们申辩说:我们有国民党政府通行证,不是‘土匪”,是履行公事的,你们捆我们没关系,误了事你们必须负责！但他们说通行证是假的。我们反驳说：“难道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也是假的吗？”他们蛮不讲理,还是扣留了我们。在小溪镇住了几天后,敌人找不到借口,只好把我们放了。从小溪镇出来后,还未到庆元县城，又遇上国民党区公所卫兵。这些身穿便衣的卫兵，公然持枪拦路抢劫，抢光了我们的钱和其它东西，而且把我们 3 人捆绑起来送往区公所。在去区公所的途中，我们又遇到六七个人，故意问:“绑的是什么人？”卫兵说是‘土匪”,我们当即反驳说,我们不是“土匪”,是共产党人,有国民党省政府开的通行证,是上级派我们去找红军，集中北上抗日的，现在国共合作，只有汉奸卖国贼才破坏合作，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那几个人看了我们的通行证后，嘀咕了几句,就把我们放了。其实,他们是同伙抢劫,没有归还我们的钱和东西。尔后我们到了庆元县，与县自卫大队队长见了面，陈铁军从他的口音中辨认出他是平阳人，于是双方互认同乡，我们就在他那住了两天,后借钱起程了。经过浦城,进入江西境内,到处打听，最后在铅山县石塘地方找到了黄道。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黄道，当即向他简单介绍了临时省委在浙南一带活动的情况。黄道听了很高兴。他说，我们原先已听到一些关于你们的消息，但由于事情很多，再加上环境的关系，一直派不出人和你们联系，现在听了你们的介绍，也就放心了。由于当时黄道很忙,我们作短暂交谈后,就相约夜里再详谈。当天夜里，黄道叫来了几个主要干部，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接着他们也向我们介绍了闽北的情况，并要求我们转告刘、粟首长。在黄道那里

住了约一星期后，我们告诉黄道，根据刘英的意思，我们还得到赣东北找关英。黄道说,你们不能去,关英那边拒绝和国民党谈判,说是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还说我们‘ 不革命 ”;‘ 叛变革命 ”;‘ 是向国民党投降 ”。黄道曾两次派人去同他联系，结果都被他误杀了。既然不好去赣东北，我们便动身回平阳了。

在返平阳的路上，我们公开走大道，但仍然遇到许多困难。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致使社会满目疮痍，混乱不堪，交通运输极不正常。当时我们从石塘出发,一直步行到上饶,准备乘火车回金华。但上饶一直无车可乘，只好从上饶再步行到玉山上车。玉山同样没有正常班车经过。若步行回家实在太费时了！怎么办？正当我们着急时，发现玉山站内有一辆机车正准备开往衢州。这时，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家商量一下，决定上车再说。于是我们 3 人偷偷摸摸上了机车，躲在煤厢里。来到衢州，一下车我们也顾不上吃饭,就四处打听班车情况,但同样无车。结果又回到车站,发现我们所乘的那辆机车，正在挂车，准备运载部队开往金华。于是我们在国民党部队没来前就摸上了车，靠在一个角落装睡。过不久，国民党部队上车后，火车开动了。这时有两个士兵发现了我们，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看他们是士兵的模样，也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两个士兵听说我们是红军，显得非常亲热，他们说，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了。说着他们还掏出东西分给我们吃。这样，我们总算较顺利地来到了金华。

到金华已是子夜，找旅馆又遇到国民党特务的麻烦，他们硬说我们是‘ 汉奸 ”,把我们带到国民党连部。连部又推到营部,无休止的盘问、搜查,弄得我们一夜未合眼。他们没能捞到什么东西,也就放了我们。在金华，我们搭上了一辆军用汽车来到丽水。在丽水又找不到车辆，只好搭一只小船顺水到温州。我们以为这下该安然无恙了，不料又遇到国民党便衣的检查。这天夜里，我们在旅馆中睡得正香，突然有几个便衣破门而入，把我们 3 个从被窝里拉了起来，对整个房间进行了搜查。他们发现我们是红军，追问我们为什

么不到九柏园头的办事处去住,硬说我们是‘ 汉奸 ”,耀武扬威地要把我们捆起来。大家看到这几个野蛮的便衣又好气又好笑，大声地讽刺他们说，温州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如果真的遇上汉奸，我看你们才认不出来呢！这些便衣听到我们的话说得很硬，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以后,我们比较顺利,回到平阳山门,向刘、粟首长汇报了闽北之行的情况。

1938 年 2 月间，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发展，闽浙边临时省委迫切需要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直接得到中央的指导。为此，刘英派龙跃和我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要求中央派负责同志来平阳直接指导工作。由于此时各方面工作已全部公开，再加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得到过共产党的帮助，在政治上比较进步，使我们这次江西之行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从平阳出发，乘汽车到金华，再由金华乘火车来到南昌。

一到南昌，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项英接见了我们，龙跃把刘英的简信交给项英，然后向他汇报了临时省委在平阳的基本情况。项英听完，赞扬了临时省委的工作，并指定曾山具体负责我们的事情。我们在晚上，向曾山详细汇报了情况。在南昌，我们住了一个多星期后有点急了，要求项英抓紧解决我们的问题。项英说，你们的问题我们已经研究了，决定派曾山亲自去你们那边。2 月底,我们和曾山 3 人,登上了开往金华的火车,再转乘汽车到了温州，后又改乘小船经瑞安到平阳，从平阳步行到鳌江。我们 3 人找到吴毓后，坐木船来到水头，第二天上午步行到达北港山门,在龙井庵和刘、粟首长会面。至此,我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原载《光辉的历程》第 110 至 112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黄 先 河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创办于 1938 年 1 月,至 3 月 15 日结业,历时 2 个多月。

1937 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为了培养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干部，决定创办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平阳山门群众基础较好,交通也方便,省委又驻在附近的大屯.红军挺进师不久前也在此集中。因此，校址就选定在山门附近山岗上的畴溪小学内。

1937 年国共合作后，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永嘉、青田、乐清、玉环、瑞安、平阳等地的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纷纷办起了战时青年服务团，他们上街演讲、化装宣传演出、办时事讲座,搞得热火朝天。1938 年 1 月 5 日,当《浙瓯日报》上刊登了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后，这些进步知识青年纷纷前来报名，从开办至结业的 2 个多月里,来校的青年、学生络绎不绝,每天都有,真是应接不暇,畴溪小学的所有校舍都住满了人。原计划干校只招收 100 名学员,实际多招收了几十名，最后学员总数为 150 名左右。其中部分学员是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推荐、介绍来的。他们多数来自浙南各县，部分来自台州和宁波一带，也有少数青年是闻讯从外省远道赶来的。学员中多数原是学生(一般为中学生,少数只读过小学,个别是大学生),也有青年工人,小学教师等。女学员约 30 人。

抗日干校的校长是粟裕，我是副校长，教导主任黄耕夫，总务主任邓野农，夏野士负责事务工作，林夫负责文字宣传工作。平西

区委书记林军中在筹建干校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学后，他又负责动员群众和民兵为干校输送给养和担任警戒工作。

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会场里张贴着抗日救亡的标语，显得庄严隆重，颇有节日气氛。会议由我主持，刘英、粟裕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刘英讲当前抗战形势，共产党抗日主张和联合各阶级，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三坚持”——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粟裕讲发动群众和全民抗日。最后，我也在会上讲了话，内容主要是勉励学员们努力学习政治、军事，负起抗日救亡使命。会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校园里朝气蓬勃，充满着团结抗日的气氛。

抗日干校的教学方法是上大课同分散自学、组织讨论相结合。课程设置和授课分工：粟裕讲授游击战争；孙克定、林国挺讲授哲学；我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忍之、梅康讲政治经济学；宿士平讲农村经济问题；陈雨笠讲工人运动；连珍讲有关民族先锋队工作。粟裕讲授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一课，常以亲身经历的实际战例来说明战术原则，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上课时，还用简易的模型沙盘作教具，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宿士平在讲授农村经济时，为加深学员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学校特地组织了一次社会调查。学员以班、组为单位，各配备一个懂本地话的同志，到学校附近各个村落一家一户调查。学员所到之处，与村民嘘寒问暖，拉家常，收集需要的情况，有的还帮助群众挑水、扫地。通过这次调查活动，不但使学员了解到农村各阶级一些经济状况，还学会了如何做调查研究工作，而且密切了党群关系。许多学员说参加社会调查确实学到了在书本上、课堂里所没有的知识。

办学时，粟裕为便于领导，就住在离干校不远的凤岭龙井庵的一间小阁楼上。他常在百忙中抽时间来看望学员，有时还参加学员的讨论会、联欢会。每天清晨的军事操练，他有空就来，尤其是学员

和部队联合举行军事演习时，他总要到现场指导和讲评。

干校全体师生，学习‘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过着军事化生活。学员编为10多个班，每班10多人，红军干部王太然、陈急冲分别担任正、副队长。教职员也和学员们一样集体睡地铺，吃一样的伙食，伙食费是每人每月3元。起床作息，都是集体行动。每天早晨天没亮，号声一响就起床，用冷水洗脸后，马上到操场集合跑步，有时还和驻地红军进行爬山比赛。干校的学习生活不但紧张，而且丰富多采，校内建立了列宁室（图书室、俱乐部），办起了壁报，组织了篮球队、足球队等，还购置了锣、鼓、琴、箫等乐器和象棋。早晚都安排了歌咏活动时间，在短短2个多月中，大家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以及《保卫马德里》等歌曲。过春节时，学校举办了联欢晚会，各班、组都有自编自演的节目参加演出。有时，学校组织的临时宣传队，到附近村庄演出短剧、歌咏，开会演讲，刷写标语，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唤起民众共同抗日。

干校学生除了上课，还参加军事训练。有一次，学校搞夜间突击演习，在紧急集合的军号声中，学员从睡梦中惊醒，摸黑整装，到操场列队集合。我严肃地宣布：“同学们！刚才接到紧急通知，日寇已在鳌江‘登陆’，与敌人浴血奋战，保卫家乡的战斗开始了。凡是决心抗日的跟红军上前线；不愿上前线的就留下来，一会儿送你们回家。”当时，没有一个学员提出要回家。接着，队长宣布纪律：尽量少带东西；行军时不准讲话、打手电。队伍出发了，红军战士在前面带路，走的全是羊肠小道，崎岖山路，没有月亮，没有灯火，过小溪，走泥路，经过二三个小时急行军，东方渐渐发白，这时大家发觉原来只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学校所在地。只见操场上堆放着各种袋子、衣包等杂物，这些都是学员们在紧急集合时和行军中丢失、由红军后勤战士捡回来的。事后，学员们总结了这次夜行军的经验教训，有的说自己临阵太慌张，不该带那么多东西，出了洋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次夜行军学员都认为是对自己革命意志和战斗准备的一次考验,很有意义。

1938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平阳山门传达党中央指示，刘英亲自带领全校师生列队迎接。曾山向干校学员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直接解答了学员们提出的许多问题，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特别是当他说到我浙南红军各游击队，将开赴皖南前线编入新四军，参加对日作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时,群情振奋,反应十分热烈。

根据临时省委决定，干校于 1938 年 3 月 15 日宣告结束。18 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即原红军挺进师)准备就绪,在粟裕率领下,奔赴皖南编入新四军,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学员自愿报名参加，经领导审查批准。第一批约 20 人组成随军服务团，跟随粟裕北上，过了几个月，又有一部分学员跟随第二批红军北上抗日。大部分学员分赴浙南和全省各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中 10 余人由连珍、林夫带领,组成新四军流动宣传队,以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依据,深入平阳、瑞安、泰顺等县的乡镇宣传、访问、演出。这支宣传队是浙南最早的文艺轻骑兵，尽管各方面都还很幼稚，但它一出现就在附近几个县引起轰动，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然而这却引起了浙江省国民党当局的惊慌。为了团结抗日，新四军流动宣传队在各县光荣完成任务后，自动宣告结束，队员另行分配工作。

闽浙边抗日干校，虽然为期甚短，但经过干校培养的学员，没有辜负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期望，他们中大部分都成为优秀的革命干部，有不少同志后来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原载《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第 392 至 395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回忆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

黄 耕 夫

1937 年 9 月中旬，闽浙边区党组织和红军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公署第二次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集中在平阳北港山门整训，于 1938 年 3 月奉命开赴皖南，整编为新四军。此时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随同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去南昌汇报工作，经过金华时，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进行会谈，决定在浙江设立 3 个新四军办事机构 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设在平阳)、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设在丽水）。其中驻温州通讯处系由 1937 年 11 月设立在九柏园头 17 号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改建，周饮冰任主任。驻浙江办事处和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都是在 1938 年 3 月间部队开赴皖南前线时设立的，前者吴毓为主任，后者黄耕夫为主任。

这 3 个机构的任务，主要是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办理新四军在浙江有关事宜，同地方军政打交道，同时也是我党的对外联络机关和党内交通站，办理军事业务并不多。因为新四军军部在丽水、金华和温州均设立采购站采购军需用品，军部直接与之联系。3 个机构都以公开合法地位，与党的秘密工作互相配合，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设在北港水头街三桥堂（今县第二中学所在地）。留守处当时除由我负责日常工作外（我还兼任平阳县委宣传部长),还有工作人员谢用卿、白云、兰德辉等 3 人。但初期平阳县委几位部长如邓扫空、林夫、黄嘉春以及叶廷鹏，也以

留守处为据点，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县委半公开的办事机关，既做公开工作，又做秘密工作。

留守处设立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根据和谈协议的规定，与瑞安、平阳、泰顺 3 县地方当局交涉，要求释放“政治犯”。国共两党合作后，国民党地方军政机关对我方人员，有时仍然刁难，甚至扣留逮捕。经过留守处派人交涉抗议，才使这些同志获得自由。对随部队开赴前线的干部和战士的家属，我们曾向国民党区乡政府提出，并通过平阳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做工作，在兵役登记时免予再征，即不再向我部队的战士家属抽壮丁。

二、留守处担负党组织对外联络和交通站的任务。当省委领导机关在北港山区时，外来人员和地方干部到省委汇报请示工作，都经过留守处。其中外来干部有的是经过温州通讯处介绍来的，由留守处派人护送到山区省委所在地。省委迁温州后，留守处仍作为省委和浙南特委的联络交通站。

留守处更多的工作，是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当部队奉命开赴皖南整编为新四军时，由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学员组成两个宣传队：一是随军宣传队(即战地服务团)，由陈雨笠负责随部队行动；另一是新四军流动宣传队，归留守处领导。在闽浙边几个县的城乡，巡回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宣传队共有队员 20 多人，由连珍、林夫任正、副队长，先集中在留守处，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准备了一批宣传材料，如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类，携带到各地散发张贴。3 月中旬，队员们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北港山门出发，经过鳌江和平阳县城，至瑞安县境，沿飞云江上游进入山区，至平阳坑、百丈口，再到泰顺县，然后至南港桥墩门等地，一路上利用演讲、演戏、唱歌、座谈会等形式，开展抗日爱国宣传，于 6 月间回到留守处。

宣传队原定在上述各地宣传后，向闽浙边文成、永嘉等县流动宣传。但因两个月来的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影响很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暗中下令各乡镇加以阻挠，并要求我们停止活动。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省委决定解散宣传队，将队员分配到各地工作。

三、留守处还直接或间接参与本县各区乡的抗日救亡团体活动。在留守处设立之前，我们即与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国民党进步人士黄强等，共同组织北港区抗敌后援会。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制定了一个《平阳县北港区抗敌救亡后援会行动纲领》,提出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这个纲领,当时曾在上海《译报》登载过。留守处工作人员也经常参与抗敌后援会活动，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如青年救亡团、妇女救亡协会以及抗日自卫队等。在游击根据地及其周围乡村，普遍建立了以农民为骨干的抗日自卫队，在北港山门还有大刀队，我们曾派留下来的军事干部帮助训练。约在 5 月至 6 月间，平阳县长徐用到北港巡视工作时，应邀到山门乡检阅抗日自卫队。山门乡集合各村千余人，手执梭标大刀，队列整齐，斗志昂扬，向县长表示抗敌决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

留守处还介绍输送一批青年进步分子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皖南新四军教导团学习。如平阳县长徐用和黄强的儿子，就是我们经丽水的驻浙江办事处介绍转赴陕北的。鳌江临时中学阮世炯、金冶、许布洛等 14 位学生，是留守处直接介绍去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学习的。

此外，由县委青年部长黄嘉春编写出了 10 多期油印小报,在水头镇和山门街、腾蛟散发。

1938 年 5 月，省委领导机关迁移到温州城里后，留守处作为党组织对外联络交通站，迎来送往的任务已经不多了，部队开赴前线的遗留问题也基本解决，只是浙南特委的干部，有时还经过留守

处。开始时,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表面上尚可以打交道,但不久,我们即获平阳、瑞安两县政府通令各区乡公所加强防范,捉拿郑海啸(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黄耕夫、曾定等的秘密文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此后,县委领导和人员都不再在留守处住宿,党的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同年 10 月 10 日温州通讯处被国民党温州当局查封,周饮冰等 7 位同志被捕,留守处也就自行撤销。

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自 1938 年 3 月设立,至同年 10 月初撤销,前后共 6 个月,但实际活动时间仅 4 个月,其后 2 个月由于形势变化,已是有名无实。在这期间,我们基本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如配合党的秘密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了本地区的救亡运动等,都是有成效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我们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国共虽然合作,但两党统战关系是不牢固的。在联合的时候,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它的特务机关,仍然采取各种手段来反对和破坏我们,但我们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没有把公开活动尽可能地同地下党秘密工作严格分开。若干党员干部习惯于国共合作初期的形势,抛头露面搞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救亡活动,甚至身背驳壳枪,大摇大摆出入留守处,暴露了我们同志的政治面貌。而在形势逆转时,又未能及时转入地下隐蔽起来,作长期打算,或者调离到其他地区,如送往皖南新四军。到后来环境恶劣时,有的同志便遭到敌人迫害。

其次,留守处(包括温州通讯处和丽水的驻浙办事处)是设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构,绝不应作为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活动场所。当留守处初建时,平阳(瑞平)县委成员除郑海啸外,都集中在留守处活动,这种把党的组织与公开机关混在一起,是不符合地下党组织工作原则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当时我们有些干部错把公开机关当作"保护伞""护身符",以为出了问题,可以由这些公开机关出面向敌人打交道,就能得到解决。

温州通讯处遭到破坏、周饮冰等 7 人被捕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当省委领导机关从平阳山区迁到温州城内后，即将通讯处作为省委办事机关，省委书记刘英和几位部长及工作人员还在那里住宿。尤其严重的是，在通讯处未遭破坏之前，国民党温台联防司令部已经正式向我们提出警告“:勒令自行撤销,否则,当派军警查封。”而我们既不立即撤离,又不作应变准备,思想麻痹,丧失了警惕性。敌人已下毒手，屠刀向我们头上砍来时，还寄希望于统战工作，派周饮冰前往交涉，提出抗议，要求放人，结果是送上虎口，有去无回，作了不必要的牺牲。当周饮冰去交涉被扣留后，还通知丽水吴毓和我到温州再一次向敌人进行交涉。吴到温后不敢冒险，遂即离开；我也因其他原因而作罢。否则，也必然和周饮冰同样结果。其实我们当时如能提高警惕，这一惨重的损失也是可以避免的。

温州通讯处遭破坏而被捕的 7 人中,除个别自首变节外,谢文清在解押途中乘机逃脱,赖大超后来刑满释放,周饮冰、郑香山、黄美平、徐惠泽 4 人在狱中长期坚持斗争,铁骨铮铮,正义凛然,受尽折磨，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受到人们永远传颂和怀念。

（原载《光辉的历程》第 144 至 148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